

张春萍◎著

转型时期俄罗斯 金融工业集团的 形成、发展与绩效分析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转型时期俄罗斯 金融工业集团的 形成、发展与绩效分析

张春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转型时期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发展与绩效
分析/张春萍著.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0
(黑龙江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7-81129-123-0

I. 转… II. 张… III. 金融-工业-企业集团-研究-
俄罗斯 IV. F279.512.44 F8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706 号

责任编辑 国胜铁

封面设计 集云观止

转型时期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发展与绩效分析
张春萍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1129-123-0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绪 论

金融工业集团的兴起与发展是俄罗斯转型期间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与西方国家的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相比,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既有一定的普遍性,又有一定的特殊性。从其普遍性来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产物,金融工业集团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从其特殊性来看,它是俄罗斯特殊的政治、经济土壤培养的产物,具有典型的俄罗斯特色。第一,它的形成背景具有特殊性。它是经济转型的产物,正是俄罗斯的激进改革和特殊的私有化政策造就了庞大的金融工业集团。第二,借助于国家政权的大力扶持,金融工业集团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发展壮大,这样的发展速度非常罕见。第三,金融工业集团(尤其是一些寡头集团)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造成的重大影响同样非常罕见。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评价毁誉参半,争论异常激烈。一些人认为,金融工业集团掠夺国家资产、俘获联邦政府、阻碍市场竞争,是俄罗斯民主制度和市场机制成功建立的绊脚石;另一些人则认为,金融工业集团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它具有某些其他经济组织形式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是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制度重建的重要力量。本书以俄罗斯的经济转型为背景,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对金融工业集团的制度背景、制度结构、

制度绩效及其发展前景作出深刻的分析和合理的判断。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金融工业集团产生于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是大规模制度变迁中出现的一项企业制度创新。与它对国家政治、经济领域所造成的实际影响相比,学术界进行的相关研究显然是滞后的。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对经济转型方式的研究与争论,即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激进”改革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改革两种转型方式进行比较分析。俄罗斯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参与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与争论,国外学者以斯蒂格利茨、热若尔·罗兰、杰弗里·萨克斯、格泽戈尔兹·W. 科勒德克等知名经济学家为代表;国内学者则包括阿巴尔金、麦德维杰夫、博格莫洛夫、亚辛等一批资深经济学家以及盖达尔、丘拜斯等青年改革派。二是对产权私有化以及私有化后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这个领域中的代表性人物是著名比较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约瑟夫·布拉西、梅里特·福克斯、麦克尔·海勒等。三是对经济转型绩效的总结与判断,这个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著名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马歇尔·戈德曼。

与上述领域相比,国内外学者对转型时期俄罗斯经济组织形式的研究比较薄弱,金融工业集团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同样未能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国外学者针对金融工业集团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在俄罗斯国内,以金融工业集团为单独研究对象的成果虽然相对较多,但在时间上大多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寡头在国内政治影响力的削弱,学术界对金融工业集团的关注也相应地有所减弱。

金融工业集团在现阶段俄罗斯的社会经济中发挥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对它进行深入地剖析和研究,认识它的形成背景、挖掘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正确判断它的发展绩效,不仅有利于推进经济转型理论的发展,也可以丰富企业组织理论,尤其可以为转型国家的企业组织变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思考。

另外,作为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金融工业集团是在市场化改革中进行的一种制度创新。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从企业组织的层面为理解俄罗斯经济转型提供独特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大国,中国在企业组织形式创新过程中实际上也面临着类似的选择,成立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正是近年来国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进行企业产权变革和重构企业组织形式的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诸如国有资产流失、公司治理效率低下、行政性腐败盛行、金融风险加大、贫富差距扩大等不尽如人意的问題。因此对中国来说,俄罗斯的相关经验和教训显得格外重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进行深刻剖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和企业集团构建等相关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二、相关问题综述

在国内外学术界,针对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形成原因、发展绩效与发展前景等相关问题上。

(一) 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原因

现有的研究成果普遍认为,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特殊私有化政策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政策大力扶持和金融寡头普遍寻租的结果。

1. 产权私有化和国家政策扶持

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结果。在俄罗斯私有化的第一阶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形成了典型的内

部人控制的局面,即由原来的企业经理和厂长去控制私有化后的企业。他们把原来行使的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权,转变为转型后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科尔奈,1999),新兴资本由此得以完成大规模的资本积聚。在私有化的第二阶段,国家推行以现金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私有化政策,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加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真正的金融寡头。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寡头的财产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贷换股”拍卖(斯蒂格利茨,1999)。在典型的“贷换股”计划中,通常是政府指定某一商业银行家主持一场拍卖,用某大型自然资源企业的控股权来换取银行对联邦政府的贷款。由于日后联邦政府无意于偿还这笔贷款,因此这些银行就可以获得该企业的控股权,进而发展成为金融寡头(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拉辛斯基,2005)。

中国学者对金融工业集团形成途径的看法基本一致。大多数人认为,俄罗斯的私有化造就了私人金融机构,也在关键部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私人企业,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二者产生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为产融结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政策上的支持,从而加速了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过程(李建民,1997;黄立蓓,1998;宋锦海,1998;张捷,1998;佟刚,1999;庄毓敏,2004)。有些学者还重点论述了在此过程中国家政权的突出作用,认为可以将金融工业集团视为俄罗斯政权的衍生物(董晓阳,1999;黄永鹏,2003)。

2. 寻租与腐败

亨廷顿(1968)观察到,政治现代化——指从独裁向更加民主的政府过渡——通常伴随着腐败的增加,他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新兴政府的统治制度不健全。在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成长史被认为是转型时期政府腐败的发展史。在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大公司被以大规模腐败的方式出售给一小撮儿有关系

的人。例如,在“贷换股”计划中,许多人曾试图参与竞拍,甚至提供更具竞争力的出价,但是却被拍卖的组织方排除在外(Freeland,2000)。这些人通过与政府的亲密关系,直接从国家手中盗窃第一笔上亿或数十亿的财富,然后用这笔财富以令人吃惊的低价从政府购进主要企业,他们很快被俄罗斯媒体冠以“盗窃者”的绰号(伯纳德·布莱克、雷尼尔·克拉克曼、安娜·塔拉索娃,2000)。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这个过程与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几乎没有什么两样。通过这种特殊的途径,叶利钦政府帮助一些商业银行家建立了巨大的金融和产业帝国,并发展成后来的寡头体系(罗兰,2002)。

中国学者也强调了金融工业集团形成过程中的寻租和腐败现象。李建民(1997)认为,在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寻租活动的泛滥;田春生(2002)则直接把俄罗斯的大规模私有化称为“大规模腐败”。

(二)金融工业集团的绩效分析

金融工业集团形成以后,对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转型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大的私有者,金融工业集团的所有者应该乐于建立私有产权制度,保护合同实施以及建设法治(Boycko、Shleifer 和 Vishny,1995)。对当前掠夺和腐败成性的俄罗斯官僚体系来说,金融寡头是唯一可行的制衡力量,他们是一批独特的选民,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去游说发展市场制度。在弱肉强食的商业竞争中,寡头也是俄罗斯国内唯一能够进行投资和重建工业体系的有生力量。因此,金融工业集团是1999年以来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制度改革的发动机(Boone 和 Rodionov,2002;Aslund,2004)。Ульянов 和 Ковров(1995)证实,金融工业集团能够起到活跃投资流向、激发部门间资本转移的作用,在发展生产合作的同时,它还能够破除妨碍部门间竞争的部门壁垒。阿巴尔金

(2001)也认为,金融工业集团促进了企业管理职能的重新划分,限制了物价的上涨(因为不再关注通过提高物价牟利),它还建立起取代进口产品的生产体系,有助于经济竞争能力的提高。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型金融工业集团尤其是寡头公司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俄罗斯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投资者对俄罗斯经济和政府的信心减少,国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变得更小了(Stiglitz,1999)。金融寡头掠夺公司资产并将这些资产输出国外,使私有产权和现代公司的观念遭人唾弃。寡头还制造了严重的不平等,俘获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使俄罗斯的民主制度形同虚设(Stiglitz,2002; Goldman,2004; Hoff 和 Stiglitz,2004)。在俄罗斯不成熟的政治体制下,寡头集团还利用政治影响力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掠夺其他经济主体(Stigler,1971; Sonin,2003; Glaeser、Scheinkman 和 Shleifer,2003)。

对于寡头企业自身的经济绩效,学术界同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寡头所有的企业都是低效率的。因为大多数这样的企业集多种行业于一身,因此存在多级代理问题,资本的重新配置效率低下(Scharfstein 和 Stein,2000)。另外,由于“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没有导致必要的资本投入和内部管理队伍的出现,所以俄罗斯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经营机制没有明显改观,经营效率没有明显提高(Stiglitz,1999)。集团中的金融机构和商务机构虽然已经成为工业企业的所有者,但它们感兴趣的往往只是外汇收入、资金控制、产业的抵押价值等,因此即使是最有吸引力的国营企业,在转手成为大银行的财产之后也未能迎来发展上的转机,企业的管理水平不能获得实质性的提高(阿巴尔金,2001)。Guriev 和 Rachinsky(2005)从政治角度分析了寡头企业低效率的原因。他们认为,如果寡头可以通过政治特权来获得和维系其地位,那么他们对提高公司绩效

就不会那么在意。

第二种观点认为,寡头有可能会改善公司绩效,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寡头经济成功克服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Boone 和 Rodionov,2002)。一个拥有大多数股份的寡头会有较强的动力去重组企业,增加资产的价值,而不是转移现金流和剥离资产。第二,纵向一体化可以降低内部人要挟的风险(在内部人要挟的情况下有相对较少的买者和卖者,每一方都必然意识到对方试图重新谈判以获取更多的共同剩余部分)。许多寡头帝国都试图解决内部人要挟问题,例如所有的俄罗斯大型石油公司都已经进行了纵向一体化;大多数钢铁制造商拥有煤炭和矿产资源;部分公司拥有自己的码头、火车和铁路轨道。第三,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手段的缺乏成为小企业进入的壁垒,而较大的寡头企业可以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并从中获益(Rajan 和 Zingales,2003;Acemoglu,2003)。第四,由于俄罗斯缺乏一个明晰的法律制度框架,因此,较之于小公司,大集团显然能更有效地影响司法和政治决策,保护财产不受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掠夺”(Grossman 和 Helpman,1994;Sonin,2003;Yakovlev 和 Zhuravskaya,2003;Kumar、Rajan 和 Zingales,2003)。^①

(三)对金融工业集团发展前景的判断

在1998年金融危机中,几个大的金融工业集团损失惨重,实力锐减,从而引起了学术界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关注。对此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金融工业巨头的发展前景是“官僚化”。在1998年金融危机过后,寡头失掉了政治资本又失去了独立性,

^① 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拉辛斯基:《俄罗斯资本主义中寡头的角色》,载《比较》第18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124页。

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正在加强,俄罗斯私人银行必然处于国家的严格管制之下。失去国家政权的支持,经营活动困难会更大,故以往的金融工业巨头会努力成为或被迫变成各种“变相的国家官员”。

另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前景是“专业化”。1998年金融危机打破了金融工业集团之间原有的界限和结构,促使其向专业化转变。在危机爆发之初,一些金融工业集团迅速对此作出反应,相互之间进行了联合或合并。这不仅可以解释为原超级寡头集团的解体和削弱,也可以视为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为了应付危机、消除危机影响进行的专业化框架改革(俄罗斯政治学所,1999),这种改革为它们在未来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分析曾在叶利钦时期盛极一时的寡头政治的走向。人们普遍认为,寡头政治在俄罗斯将走向终点,因为约束寡头的政治影响力曾是普京在2000年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基本议题。在致选民的公开信中,他承诺将一视同仁地对待寡头和其他企业家(Konnorsant,2000),并与寡头们约法三章。在“尤科斯事件”以后,寡头们认识到了违反约定的风险,因此在未来将不大可能涉足国家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使未来寡头们仍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将变得无足轻重(Guriev和Rachinsky,2005)。

三、本书的结构及结论

(一)本书的结构

除绪论以外,本书共包括五章内容。

第一章是针对金融工业集团进行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由于理解金融工业集团的关键是产融结合,因此,本章的第一节主要分析了金融资本与产融结合理论。包括金融资本理论的产生与

发展、产融结合的形成途径等相关问题。第二节对产融结合的形成动因作出理论解释,这实际上是对金融工业集团形成原因所作出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第三节分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发展过程与模式变迁。这是在经济全球化时期,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得以形成的重要经济环境与制度背景。本章的第四节从多个角度解释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内涵与类型,并阐述了一些与之密切相关的常用概念。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本书设计了一个针对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制度分析框架。包括它得以形成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根源、它赖以生存的内部制度结构和外部制度环境、它的制度绩效及其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所面临的发展前景等基本内容。

第二章从经济转型的角度对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背景和形成原因作了深刻剖析,指出经济转型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金融工业集团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本章第一节介绍了金融工业集团产生的制度背景——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包括经济转型的初始状态、约束条件、转型策略、转型绩效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与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密切相关。第二节考察了金融工业集团形成的初始制度环境,即前苏联末期的历史、社会和经济体制。第三节揭示了金融工业集团形成的制度性根源,指出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克服转型时期的市场功能缺陷。第四节指出俄罗斯特殊的私有化方式是直接导致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出现的制度条件。第五节分析了在金融工业集团形成过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政府。它为金融工业集团的壮大与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制度支撑。

第三章为金融工业集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纵向分析的视角。本章分别从政治、经济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过程。第一节使用利益集团理论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与俄罗斯政府的重复博弈,以及由此决定的它在国家政治领域里的发

展轨迹。第二节到第五节从企业组织角度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企业制度。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成员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指出俄罗斯私有化企业形成了典型的内部人(经理和职工)控制型公司治理结构,企业的所有权和企业的控制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企业内部人手中。第三节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典型的金融工业集团采用的是控股公司制组织结构,母公司持有子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份,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监督比较间接。第四节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管理体系。在金融工业集团的母公司内部,科层制是管理控制的基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控制一般来说是官僚式控制和市场式控制的混合结构。第五节考察了金融工业集团内部的银企关系。由于俄罗斯转型后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导致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减弱,集团内部的银企结合状况并不理想。

第四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运行绩效。前两节从宏观角度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对俄罗斯政治、经济转型的双向影响。第一节首先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负面影响。作为前期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金融工业集团阻碍了旨在重新分配利益的进一步改革,使俄罗斯的经济转型长期陷入无效率的制度闭锁状态。它们垄断市场,排斥竞争,因此加剧了地区间、行业间和企业间的不平等现象。寡头还掠夺公司资产,加剧了转型时期的资本外流和国有资产流失。另外,由于金融工业集团的阻挠,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也延续至今而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对国民经济的积极影响。指出它在帮助国家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建立市场化资金流动机制、代表俄罗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节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集团自身的经济绩效。指出金融工业集团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经济中最

活跃的部门,与其他经济组织形式相比,它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五章探讨了金融工业集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与发展前景。第一节指出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金融工业集团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存在诸多缺陷。包括支持法治与诚信的政治环境缺失、针对金融工业集团发展的有效国家战略缺乏以及薄弱的商业银行体系制约等不利因素。第二节分析了金融工业集团的内部制度结构缺陷。其中包括:寡头经济具有鲜明的人格化特征,因此容易受领导人更新换代的影响。一些金融工业集团在成立和运营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短期性和不规范性,从而影响了它们的健康、稳定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集团内部的银企之间尚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这导致金融工业集团丧失了一些基本的功能,也使它的长期发展难以为继。第三节分析了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工业集团的外部制度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强势政府的出现、经济主体对法治需求的增强、宏观经济的好转、经济的竞争性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都在促使金融工业集团作出必要的制度调整。第四节对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前景作出展望。虽然在金融危机和强权政府的双重打击下,金融工业集团的实力大为削弱,但从长期来看,金融工业集团仍将在俄罗斯的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二) 主要结论

通过对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系统性分析,本书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结论一: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经济转型中的一项具体制度安排,它的形成兼有强制性和诱致性的双重特点

从经济形态上看,金融工业集团是一种企业组织形式;从政治角度分析,金融工业集团是一个利益集团。但这些都是对金融工业集团的表层理解,从本质上来说,金融工业集团是俄罗斯

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一项制度安排。它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制度背景,并对周围的制度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从金融工业集团组建和发展的过程来看,这项制度安排既有强制性的成分,也有诱致性的特点。^①从强制性角度来看,许多大型金融工业集团都是在国家的帮助甚至是直接的行政命令下组建的,它们大多肩负着各种财政和产业方面的职能和任务。从诱致性特点来看,金融工业集团成立的内在基础是产融结合,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产物。虽然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但在经济转型后也出现了产融结合的客观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私有者(主要是一些私人银行和私人企业的所有者)窥视到了其中的潜在利润,主动参与了这项制度安排的创造。

结论二:由于相关制度的缺失和不完善,金融工业集团的运行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俄罗斯政府成立金融工业集团的初衷,是希望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集团的成功经验,将其培育成带动经济走出危机的经济组织,并能凭借政府的支持和集团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启动经济增长。但由于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制度体系残缺不全,一些必要的市场制度,如国有资产管理、产权保护、公司治理、产权交易市场等尚未建立或完善,结果导致借鉴来的制度安排难以奏效。因此,当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产融结合制度被移植到俄罗斯的时候,却产生了非常奇特的、处处充斥着矛盾和冲突的金融工业集团:它的身上既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官僚性、垄断性、低效激励机制等),又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产权结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设计等);它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

①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1989)提出了制度演进的“诱致—强制性变迁模型”。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的。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又是推动国民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力量;它既是一个与腐败政府相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又是一种对贪污和掠夺成性的俄罗斯官僚体系的实际制衡;它既是一种对银企结合具有较高要求的产融型企业集团,又由于内、外部制度体系的制约而造成了集团内部银企之间的弱结合。

金融寡头的独特发家史,更能说明没有适当制度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难以获得成功。在私有化过程中,如果缺乏一个合适的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私有化就不仅不会带来增长和繁荣,反而可能带来盗窃、欺诈和掠夺,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严重的、足以阻碍公司有效重组的内部人控制局面。

结论三:金融工业集团的稳定发展需要法治政府的有效支持

金融工业集团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是深刻影响其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它的产生与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扶持。在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帮助企业组织进行体制改革是合理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并不具备独立进行制度变革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在经济中已经出现潜在利润、但诱致性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某些制度创新,培育和扶植起一批能够承担并实现政府经济规划的市场主导力量,这正是俄罗斯政府组建大型金融工业集团的根本动因。

但是,在大力扶持金融工业集团的过程中,俄罗斯政府没能与它们保持合理的距离和制度化关系。转型初期的叶利钦政府过于软弱,因此被强大的金融寡头所俘获。这个特殊利益集团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资源,拒绝一切可能对其既有利益构成威胁的进一步改革,从而使俄罗斯的经济转型长期陷入无效率的制度闭锁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转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国家权威主义是必需的。但政府也不能过于强大,甚至失去对自身的约束,否则就会发生贪婪的国家大肆掠夺经济主

体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建立法治国家,只有政府和经济主体都受法治的约束,才能实现二者之间的互惠性关系,进而推动经济转型走上高效的良性发展轨道。